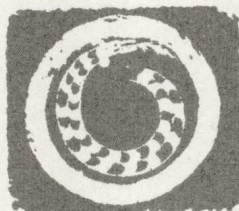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八

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韦心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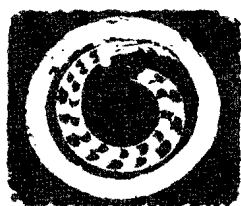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八

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韦心滢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 韦心滢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4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八)
ISBN 978 - 7 - 5325 - 6715 - 7

I. ①殷… II. ①韦… III. ①政治地理学—研究—中
国—商代 IV. ①K901.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287 号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二十八

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

韦心滢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28.25 字数 601,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100

ISBN 978 - 7 - 5325 - 6715 - 7

K·1668 定价: 12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目 录

序	朱凤瀚(i)
绪论	(1)
第一章 商前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探讨	(12)
第一节 商前期王国政治领域的文献观察	(12)
第二节 商前期王国政治领域的考古学观察	(25)
第三节 商前期王国都城位置与势力范围变化分析	(54)
小结	(60)
第二章 盘庚迁殷后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的变更	(61)
第一节 再论盘庚迁殷	(61)
第二节 洹北商城与周围邻近聚落	(73)
第三节 盘庚迁殷后领土格局之转变	(84)
小结	(87)
第三章 商后期王国王畿内的政治地理结构	(89)
第一节 殷墟考古资料所见王都内部结构	(89)
第二节 殷墟卜辞所见之王都内涵	(133)
第三节 殷墟卜辞中所见王都郊区内之各种功能区及其设置	(155)
第四节 文献所见商后期王畿	(160)
小结	(169)
第四章 商后期王国四土之近畿地区的政治地理结构	(172)
第一节 王卜辞中所见“子某”的属地分布	(172)
第二节 “非王卜辞”所见近畿内商人贵族家族领地与其居住状态	(181)
第三节 近畿内商王田猎区之政治地理意义	(206)
第四节 居住于四土之近畿地区内的商人族属对商王朝担负的经济义务	(231)
第五节 近畿内商王常居地	(239)
第六节 商王国近畿区域范围之考古学观察	(247)

小结	(260)
第五章 商后期王国四土之边域地区及其政治格局(上)	(262)
第一节 从战事卜辞看商人雄族在边域的分布暨边域内的地域区划	(262)
第二节 帝辛十祀征夷方卜辞所见商王国的东南边域	(282)
第三节 边域雄族对商王朝担负的政治与经济义务	(290)
第四节 由外服制所见商王朝强化边域控制之手段	(294)
第六章 商后期王国四土之边域地区及其政治格局(下)	(310)
第一节 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西部边域状况——灵石旌介商墓暨 周边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310)
第二节 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南部边域状况——罗山天湖墓地暨 周边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325)
第三节 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东部边域状况——大辛庄遗址暨 周边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335)
第四节 考古学资料所见商后期王国北部边域状况——藁城台西遗址暨 周边商后期考古文化遗存	(346)
小结	(353)
第七章 商后期王国与边域外邻近方国的关系	(356)
第一节 殷墟卜辞中所见方国与商王朝的互动关系	(356)
第二节 商后期商周角力关系及实力之变化	(366)
第三节 商后期王国边域外文化遗存中商王朝政治影响力的显现	(377)
小结	(409)
第八章 结语	(410)
参考文献	(426)

绪 论

一、研究本课题的学术意义

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地理结构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课题,学界陆续有人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个人选择此一方向作为论文选题,便是希望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以商后期王国(定都安阳后的王国)作为典型案例,对这一课题进行更为细致而深化的工作。

关于“政治地理”的内涵,学界有过不同的表述。如德国有机组织学派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认为:政治地理学是“对国家这个有机体所作的空间研究,国家的大小、形状随其居民而定,且该国与环境关系的性质,会影响国家成长的速度”^①。美国政治景观学派代表人物惠特莱西(D. Whittlesey)主张政治地理学是对政治景观进行研究,并将中心区看作国家的发源地,每一个国家就是在中心区扩展的基础上形成的^②。美国学者哈特向(R. Haushofer)认为政治地理是对国家的功能进行研究,而国家功能包括内在的国家观念等,外在功能则为国家和国家内其他区域以及和外在区域之间的关系^③。英国学者缪尔(R. Muir)则认为政治地理就是对政治系统运行的过程和周围环境的关系进行研究^④。我国学者李旭旦提出政治地理是“研究国家与地区等各种类型的领土内与领土间的政治活动现象之地理分布或空间布局”^⑤。综合上述各家说法,可以将政治地理学的要旨概括为:从空间角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过程中地理空间的变化,简言之即政治区域及其变化的研究^⑥。

本选题根据上述“政治地理”的概念,并结合中国上古历史特点,特别是商代历史背景状况,将本书所列为研究对象的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之内容归纳为以下三个方向:其一是当时商王国所控制的地理空间,即其政治领域范围;其二是在此领域空间中所体现的政治格局,即商王朝领土之政治结构与王朝对地方的统治管理方式,中央王朝与地方以何种关系相系联;其三是商王国与周边方国的关系。

① 王恩涌:《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88—196页。

② Derwent. Whittlesey, *The Earth and the State: A Study of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York: Henry Holt, 1939, p. 3.

③ 王恩涌:《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2—33页。

④ Muir R., *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1981, p. 27.

⑤ 李旭旦:《人文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208页。

⑥ 王恩涌:《政治地理学时空中的政治格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页。

本书所研究的课题具有以下重要学术意义:

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不仅能体现中国早期国家之结构形式,且是迄今有文字与考古资料可证的中国最早期国家,特别是作为当时东亚地区最强盛的王国,在世界早期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占有独特地位。商王国作为处于相对封闭独立的内陆而发展起来的早期国家,与同时代新王国时期的埃及及古巴比伦帝国相比,可以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种早期国家形态模式。因此,研究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不但能让我们对商王朝的领土政治结构、土地空间的管理方式暨与周边方国关系有进一步了解,更重要的是,透过政治地理角度的研究剖析,将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态有更具体而深入的认识,这同时也是对人类早期文明史,特别是国家史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研究工作。

二、本课题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一词的提出,最早见于李学勤先生的《殷代地理简论》^①,其所提出的观点与切入视角,为后学者提供了深入研究的框架。此后,有关商代政治地理的研究成果渐丰,根据本书主要研究内容拟从以下四个方面作简要评述:(1)商前期王国都邑屡迁之原因与其相应之都城制度;(2)商后期王国王畿的范围与其内之政治结构;(3)商后期王国王畿外之政治格局;(4)商后期王国与边疆外方国的关系从属问题等,以下对有关学术成果分别进行扼要的述评。

(一) 商前期王国都邑屡迁之原因 与其相应之都城制度

针对商前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与相应的形态问题,目前尚无学者有正面研究,但与此内容相关的议题有“王都屡迁”、“盘庚迁殷”以及对商后期都制的讨论。

1. 王都屡迁

商人自契至汤有八迁、汤至盘庚有五迁。王都屡迁的原因古人有去奢行俭与水患说。至20世纪70年代前又出现游牧说与游农说。近年来,学者提出一些新观点,如从军事角度考虑,即邹衡先生《论汤都亳及其前后的迁徙》^②中主张成汤居亳是为了战胜夏王朝,祖乙以后王都安置在太行山东麓,是为了对付存在于山西与河北境内的敌对势力;也有些学者认为屡迁是缘于王位纷争所引起的政治内乱问题,如黎虎先生《殷都屡迁原因试探》^③、

①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95页。

② 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③ 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4期。

王冠英先生《殷都屡迁原因、过程及殷后期诸王之改革》^①,另杨升南先生在《商人屡迁原因》^②一文中也提及因内部分乱,国力削弱造成外患逼迫而迁都的看法;新观点的论述中还有晁福林先生在《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代屡迁原因》^③一文提出殷都所以屡迁是因为方国联盟政治中心的转移。

以上诸家文中所提“殷都”、“殷后期”、“殷代”等名词,与本书将“殷都”、“殷代”仅指盘庚迁殷后的“商都”和“商后期”不同。邹衡先生提出祖乙以后王都的设置是为对付来自西北和北方敌对势力之观点,给予笔者探索盘庚迁殷的方向,值得进一步思索。持政治内乱造成迁都原因的学者,以文献所载九世之乱和屡迁都城的时期相契合为切入点,立意虽新,但迁都等于解决内乱问题的逻辑难以使人信服。方国联盟政治中心的转移造成都城屡迁,首先便牵涉到是否有方国联盟的前提,此问题本书将会做进一步探讨。

2. 盘庚迁殷

盘庚迁殷的“殷”究竟为今何地及其原因,众说纷纭。目前学界的说法可归纳为以下四种:

(1) 盘庚所迁之“殷”为安阳:古本《竹书纪年》提及盘庚自奄迁于北蒙之殷,在邺州南 30 里,273 年^④更不徙都,此为最早记载。王国维先生在《说殷》^⑤中肯定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邹衡先生也在《西亳与桐宫考辨》^⑥中提出殷墟发掘已证实盘庚迁殷于邺南无误,偃师商城下限年代不晚于二里岗上层,其绝对年代与武丁时代相距甚远,两者无法衔接,故偃师商城不可能为盘庚所都。

(2) 盘庚所迁之“殷”为偃师:《史记·殷本纪》曰:“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遂涉河南,治亳。”皇甫谧曰:“今偃师是也。”持此说法的学者有彭金章先生、彭晓田先生,他们在《试论河南偃师商城》^⑦中认为盘庚所迁之殷并非安阳小屯,安阳小屯可能是从武丁时才作为都城,作为“成汤故居”的河南之亳,应是偃师尸乡商城。

(3) 盘庚所迁之“殷”为洹北商城:1999 年洹河北岸发现洹北商城,西南紧邻殷墟保护区,城内分布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群,文化遗存介于郑州二里岗时期后至殷墟文化一期前。由于规模宏大,又靠近安阳殷墟,洹北商城的性质在学术界多有讨论。早在洹北商城未正式发掘前,唐际根先生即发表《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⑧,提出遗址性质、

① 王冠英:《殷都屡迁原因、过程及殷后期诸王之改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 1 期。

② 杨升南:《商人屡迁原因》,《甲骨文商史丛考》,北京:线装书局,2007 年。

③ 晁福林:《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代屡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 年第 4 期。

④ 《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原作 773 年。晚清金陵书局本作 253 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据赵绍祖:《校补竹书纪年》卷一、陈逢衡:《竹书纪年集证》卷四九改作 273 年。日本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卷三作 275 年。金陵书局本误字颇多,泷川资言以金陵本为主,故改无所本。以上诸说中似以《存真》273 年说较为妥当。

⑤ 王国维:《说殷》,《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 年。

⑥ 邹衡:《西亳与桐宫考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续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 年。

⑦ 彭金章、晓田:《试论河南偃师商城》,《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 年。

⑧ 唐际根、徐广德:《洹北花园庄遗址与盘庚迁殷问题》,《中国文物报》1999 年 4 月 14 日。

年代与“河亶甲居相”及“盘庚迁殷”均相吻合,不排除两者其中之一的可能性。杨锡璋先生、高炜先生、徐广德先生所作《盘庚迁殷地点蠡测》^①与岳洪彬先生、何毓灵先生《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②均认为盘庚迁殷之地应是洹北商城,经历小辛、小乙至武丁时迁至洹水南岸的殷墟。另朱光华先生也认为洹北商城为盘庚所迁之殷,但小屯殷墟则为小乙以后商王所居之地^③,持类似看法者尚有李民先生的《安阳洹北商城性质探索》^④一文。持不同看法的学者为刘绪、雷兴山诸先生发表的《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⑤,认为洹北商城较有可能是河亶甲居相之地。

(4) 两都并存或先后续存:李民先生在《关于盘庚迁殷后的都城问题》^⑥中提出夏商时可能有两都并存制,其中一都为主要,所以盘庚时主都在安阳,辅都在西亳故居。

综上述,商前期王都屡迁的原因已从经济、政治及军事层面展开讨论,但是经济说似乎将商人看得过于原始,政治说似乎违反据都为王的经验法则,因此军事立都的说法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索。另外诸位学者虽注意迁徙地点与今日位置的考证,但仍有尚需加强讨论的地方,如应重视将考古成果与文献考证结合。另外,盘庚迁殷的原因究竟应如何认识才能更贴近当时的实际历史,其后为何不再迁都的理由,这些尚存的问题将成为本书继续研究探讨的课题,而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则是本书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至于商王国将都城迁至安阳后,对于国家政治地理结构与相应的国家形态转变的重要意义,前人未予深究,这部分的理论性学术问题更是笔者要深入阐释之处。

(二) 商后期王国王畿的范围与其内之政治结构

有关商王国王畿区域范围的讨论有宋镇豪先生《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及《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⑦二文,前文利用商前期五都迁徙和盘庚迁殷的地理位置,得出商代王邑的位移基本上皆在河南中部偏北及河北南部一带范围内;又通过军事交通卜辞和《战国策·魏策》的记载相互参照,确定晚商时期的王畿范围。后文更进一步阐明商王朝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为王畿、四土(四方)和四至三个层次,王畿是以商邑为轴心的商地。1963年松丸道雄氏在《殷墟卜辞中の田獵地について——殷代国家構造研究のために》^⑧一文中对田猎地进行比对与考证,得出商王田猎地距离王畿在一日内的路程范围,试图透过对田猎地名的分析研究,探讨商王国的国家结构,其中自然涉及王畿的地域范

① 杨锡璋、高炜、徐广德:《盘庚迁殷地点蠡测》,《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② 岳洪彬、何毓灵:《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商代遗存的认识》,《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③ 朱光华:《洹北商城与小屯殷墟》,《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

④ 李民:《安阳洹北商城性质探讨》,《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⑤ 刘绪、雷兴山:《洹北花园庄遗址与河亶甲居相》,《文物世界》1999年第4期。

⑥ 李民:《关于盘庚迁殷后的都城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

⑦ 宋镇豪:《商代的王畿、四土与四至》,《南方文物》1994年第1期;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⑧ 松丸道雄:《殷墟卜辞中の田獵地について——殷代国家構造研究のために》,《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31号,1963年。

围。另郑杰祥先生在《商代地理概论》^①一书中专列一章讨论商王畿的范围、王畿以内的山川河流与附近地名考证;王震中先生发表的《商代的王畿与四土》^②,则依据《战国策》确定商后期王畿范围,并据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之间距离来推断商前期的王畿范围。此外林欢女士所撰写的博士论文《晚商地理论纲》,后由孙亚冰女士辑编成《商代史·卷十·商代地理与方国》^③,其中以对地方性军事组织成、行、师、卫的考察来勾勒商王畿的范围,并通过殷西南的战争情况与帝辛十祀征夷方确定王畿的东、东南及西限。

有关王畿内部结构的讨论有安阳殷墟是否为商后期都城的争论。早在1970年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氏《中国上代の都市国家とその墓地——商邑は何処にあったか》^④一文中即提出殷墟非王都的说法,其后又有秦文生先生《殷墟非殷都考》^⑤,认为殷墟没有城墙,与陵墓区太近,应为武丁至帝辛的王陵与祭祀区。提出反驳意见的有杨锡璋先生,其《殷墟的年代及性质问题》^⑥一文从甲骨刻辞、建筑遗址、墓葬分期考证安阳殷墟始于武丁作为商后期都城。2006年孙华先生提出小屯建筑基址非商王宫殿区的说法,并假设殷墟遗址以东,即今安阳市区,原安阳县旧城所在为商后期王都的可能,为王畿中心所在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⑦。

综合上述,宋镇豪先生与林欢女士运用军事卜辞材料划定王畿范围的研究角度,以及王震中先生借鉴周代西都、东都的概念,在两都之间的范围必为王畿的观点,得出商前期王畿的范围,这些研究方法都极具昭示意义。松丸道雄氏研究田猎卜辞兼及王畿区域,也为此方向的研究指出一条可行的路径。而郑杰祥先生在王畿附近山川地名方面的考证,对今古地理位置的了解提供了更多讯息。然而学者对商王畿的研究多致力于王畿范围及附近地名的考证上,较少关注王畿内部的布局与变化,以及商王对王畿的管理方式。

另否定殷墟为王都的论述中所指出的问题,十分值得深刻思索,从文献、甲骨卜辞、考古资料中都可以感受到商后期王国的王畿区域内似非安阳一处都城,商王尚有其他重要政治、军事活动处所(或称都邑)。特别是沫邑朝歌在商末的重要性实不容忽视,这些重要都邑与安阳的关系以及殷墟的性质与功能,也都值得再进一步深入考察。

(三) 商后期王国王畿外的领土与边疆政治格局

在讨论商王国王畿外的领土与边疆问题时,首先碰触到四土、四至的范围,其次便是

①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② 王震中:《商代的王畿与四土》,《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

③ 孙亚冰、林欢:《商代史·卷十·商代地理与方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④ 宫崎市定:《中国上代の都市国家とその墓地——商邑は何処にあったか》,《東洋史研究》28卷4号と29卷2、3号,1970年3、12月。

⑤ 秦文生:《殷墟非殷都考》,《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

⑥ 杨锡璋:《殷墟的年代及性质问题》,《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

⑦ 孙华:《关于殷墟布局的新认识》,《“周边”与“中心”:殷墟时期安阳及安阳以外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6年。

外服与边疆的关系。

1. 商王国边疆与“四土”相关问题

学者多认为商王国的疆域是由王畿与四土共同构成。已有诸多学者对四土的问题进行探讨,兹分类如下:

(1) 四土的概念较为宽泛,甚至包含有敌对方国在内:彭邦炯先生在《商史探微》^①中提出:王畿周围是与商王同姓和异姓的国族,其外又有从属的方国部落,他们活动的区域就是商王国的领土——四土。当时的疆域没有明确界线,也无现代中央与地方的严格统属关系,因此只要承认商王为贡主,以商王国为宗主国,则从属于王朝之下的侯伯之邦及有纳贡赏赐关系的各方国区域,都应视为商王朝疆域的一部分。持相同看法的尚有李民先生,他将商王朝疆域分成王畿、统治区和影响所及区三层次,即使在统治区内,仍存在许多方国时亲时叛^②。厉声先生在《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雏见》^③中提出:四土是王朝疆域的主要组成部分,在王畿之外、疆域以内的诸侯国都称之为四土。王震中先生将四土视为一种开放而不稳定的状态,商虽对四土具支配权,同时又会因与侯伯方国关系的变化而有所消长。并透过考古学材料勾勒出四土的轮廓并非一个完整的圈环,而是商领地与各个附属国族地与邦方敌族地盘犬牙交错的情况^④。

(2) 四土是王畿外、四至内的区域:陈梦家先生认为商王国疆域包含商(大邑)、王畿外(奠与四土)与四戈(殷边)^⑤。宋镇豪先生在专题论述商代的政治地理结构时提出商王朝国家政治疆域的地理架构表现为“王畿”、“四土或四方”与“四至”三层次。王畿区外是四土,是和商王朝政治关系密切、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的区域,即王朝控制的国家政治疆域地理;四土之外为四至,是商王朝势力及其文化波及影响的周边地区^⑥。宋新潮先生认为“四土”是王畿之外由商王朝的贵族、官吏统治的区域,其中包含着“商文化亚区”(文化遗存在性质上属商文化范畴,但又具独特地方性色彩)及臣属方国^⑦。另李伯谦先生利用出土青铜器族氏名号的地理分布来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认为王畿之外分布着臣服于商的异姓国族,其外则是与商王国经常处于敌对方的方国,故商王朝已非方国联盟阶段,而为王权国家^⑧。李伯谦先生的研究方法、视角给予笔者在进行边域内、外考古文化遗存分析时,提供了判断与参考之依据。

① 彭邦炯:《商史探微》,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年。

② 李民:《商王朝疆域探索》,《史学月刊》2004年第12期。

③ 厉声:《先秦国家形态与疆域、四土雏见——以殷商国家叙述为主》,《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16卷第3期。

④ 王震中:《商代的王畿与四土》,《殷都学刊》2007年第4期。

⑤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⑥ 宋镇豪:《论商代的政治地理架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⑦ 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⑧ 李伯谦:《从殷墟青铜器族徽所代表族氏的地理分布看商王朝的统辖范围与统辖措施》,《考古学研究》(六),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四土大部分非商人领土,仅点状聚落为商人势力范围:王玉哲先生在《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①中认为商王国的国界仅局限于大邑商附近,周围散布着属于王朝的数十个诸侯据点,据点和据点之间散布着不属于王朝或敌对的方国。因此王朝国家所控制的国土只是“点”的概念,没有连成面及疆界的想法。

2. 外服与边域的关系

外服虽是西周分封制的滥觞,但在商后期是官制,外服官员所职守地区应是商王国的领土边域。在《尚书·酒诰》中周公言及商后期王国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西周铜器大盂鼎铭文中也可见“……我闻殷述(墜)命,惟殷边侯、田、甸、男、卫、邦伯,率肆于酒,古丧师已(矣)……”的记录,在卜辞中则可见侯、伯、田、卫等的外服职官名。因此研究外服,将有助于了解商后期王国之领土四至与边疆政治格局。

岛邦男氏在《殷墟卜辞研究》中利用对卜辞的整理与归纳,提出商在边境配置“侯、伯”,抗击外寇,同姓被封在各地作为屏障,在四方设“服”,担任治安与营田^②。1983年,杨升南先生于《卜辞所见诸侯对商王室的臣属关系》一文中认为四土是诸侯治理的封国^③。王贵民先生在讨论商朝官职及其历史特点时认为侯、田、男、卫均为地方行政长官,非独立封国,而是隶属于商王朝并为之服务的一般行政实体^④。另外,裘锡圭先生从甲骨卜辞资料探讨侯、甸、男、卫的起源,阐明了这些身份称号是由职官名称演变而来,侯的本职是为王斥侯,甸的本职是为王治田,卫的本职是为王捍卫,男的本职是为王任事。职官发展成诸侯受到地理距离的限制,距离商都较远担任斥侯、保卫、田牧者,才有可能发展成为诸侯^⑤。唐晓峰先生在《商代外服与“地方”权力》一文中表示,内服与外服作为两套职官系统,正对应着商人的本土与商王朝扩土所得区域。外服的形成是经由收服归属方国,派驻军事守卫、开发农田牧场等过程而来,当外服地区趋于稳定后,王官在王权的认可下朝诸侯化转变^⑥。

综上,对于“四土”的范围划分及其内部政治地理结构的认知,学者有较分歧的看法。持王畿外即四土,且四土呈现时有消长的动态变化观点者,为研究中国上古国家边域形态提供了绝佳思路,但将四土范围全盘看做不稳定区域或仅支配一些散状据点,则太过弱化商王国对疆域的控制权。持王畿外为四土,即商王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四土之外为四至,多分布与商王国敌对之方国者,对王畿外的领土与非领土之间做了明确划分,并说明四土内受商王朝管辖。然过于明确的划分,反倒模糊了商王国边域的独特性。鉴此,笔者将从

① 王玉哲:《殷商疆域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点和面的概念》,《郑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②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58年,第460—461页。

③ 杨升南:《卜辞中所见诸侯对王室的臣属关系》,《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④ 王贵民:《商朝官职及其历史特点》,《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⑤ 裘锡圭:《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文史》第十九辑,1983年。

⑥ 唐晓峰:《商代外服与“地方”权力》,《江汉论坛》2006年第1期。

非王卜辞、农事卜辞、田猎卜辞、战事卜辞的分析,配合考古资料,进一步尝试着将“四土”进行较细致地层次划分,以条理性地展现其内在政治地理结构。

关于外服的讨论,岛邦男氏认为殷的封建包括侯、伯、子、男,因此将外服职官中的侯视为爵称,此点笔者并不认同。但其对侯、伯配置于边境抵御外侮,外服设置于四方负责治安与营田的观点,却是至为正确,只是未能深入说明“服”的性质。将侯、田、男、卫视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学者,其观点对理解外服制颇具启发,尤以裘锡圭先生对侯、田、男、卫相关卜辞精辟的阐释,给予对商代外服制的理解具更深刻的认识。惟上述研究者皆忽略外服与地缘之间相对应关系,以及侯、田、男、卫之间横向联系关系为何?外服职官与商人雄族同在边域的任务分工为何?这些皆是笔者需要深入探讨之处。

(四) 商后期王国与边疆外方国之从属问题

讨论商后期的方国问题,首先面临的是商王国与方国之间的关系。方国位于四土以外的邻近地,在卜辞上多称为“某方”。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可概分成两类:

1. 方国地望

利用卜辞梳理方国个数与地理位置的学者首推陈梦家先生与岛邦男先生^①;接着李学勤先生在《殷代地理简论》中使用甲骨卜辞探讨商王国以外的方国及其与商的关系^②。丁山先生在《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中的《殷商氏族方国志》一文也对卜辞所见的43个氏族方国的地望进行考证^③。台湾学者钟柏生先生在《殷商卜辞地理论丛》一书中提出卜辞中异地同名的说法及利用相近地名群的研究法,在岛邦男先生对田猎地勾画的构想上,增补修订商王朝后期领土范围与方国地望^④。另郑杰祥先生在《商代地理概论》一书中亦以卜辞为媒介,探讨了商代的部族方国与今日地理位置所在^⑤。

2. 商王国与方国从属关系

林沄先生在《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一文中虽同样从卜辞出发,但另辟蹊径地借鉴古埃及王朝早期国家形式,进而考定卜辞中“比”是亲密联合的意思,得出商王国是城邦国家联盟体制的结论^⑥。持不同看法的有王巍先生《商王朝与方国》一文,利用文献与考古材料说明商王朝控制周围方国的方式是军事征伐,从而得出商王国与方国之间是宗

①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58年,第424—434页。

② 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③ 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④ 钟柏生:《殷商卜辞地理论丛》,台北:艺文印书馆,1989年。

⑤ 郑杰祥:《商代地理概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⑥ 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林沄学术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①。

综上得知,诸多学者从断烂朝报的卜辞中,整理出方国的地理位置,虽然某些方国位置仍有争议,但其研究成果已为后代学者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而商王国与方国之间的关系为何种形式,目前仍未有定论。本论文欲藉由前辈考定的方国地理成果,反向勾勒商王国边界,并结合卜辞内容与考古资料进行综合研究。另外,除借鉴学者们探讨的商王国与方国彼此的相处之道外,也将利用商周关系与“周灭商”的史实情境来反思商王国的政治结构,以期产生不同的研究思路,得到崭新的研究成果。

三、研究主旨与结构

本书目的是欲从政治地理结构层面来分析商后期王国领土范围,并进一步探讨领土内的政治结构,即政治地理区域分类与各区域内的人地关系,中央对地方的统治方式以及地方对中央担负的功能。最后,结合商王国地理空间及国土伸缩的过程,来研究商王国与周边邻近方国彼此之间的相处方式。

按照上述主旨,本书对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研究,拟一方面本于上述“政治地理”概念与其范畴从理论上界定研究内涵,另一方面,将研究重点放在上文述评中所归纳出的对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中尚存的若干问题上。该书拟在深入钻研文献记载的基础上,将文献与古文字资料(甲骨文、金文)及考古发掘材料(墓葬、遗址及遗物等)相结合,尽可能真实、具体地阐释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与相关的国家形态。

本书在结构安排上依据如下的思路与逻辑:

1. 首章将讨论商前期汤都亳与屡迁都城的两种都城情况,以及商前期商人势力范围所及。虽然商前期并非本书讨论的主要对象,但欲理解盘庚迁殷后政治地理结构发生转变之意义,概论商前期的政治地理结构还是必要的。

2. 本书第二章讨论商前期向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的转变问题。商前期后半叶都城不断迁移,似表示此时期的王国尚未形成有固定的政治、军事中心及相系联的向心式政治地理结构。在“盘庚迁殷”后,都城迁徙时代告终,转变成以王都(畿)为中心向外扩张的国家形态。本书将探讨这一转变的关键因素及其重要意义。

3. 本书第三章将重点考察商后期王国王畿区域的大致地域范围以及其内部布局,并探究王畿内部不同区域的政治功能。

4. 为了能更细致地研究王畿外四土之政治地理结构,本书将“四土”内居于王畿和边域之间的地理区域称为“近畿”。这块区域的大致范围与其内的政治地理结构为何,是本书第四章探讨的主要问题。其次,本章亦将进一步探讨近畿与王畿之间的关系、近畿内的

^① 王巍:《商王朝与方国》,荆志淳、唐际根、高岛谦一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

居民成分、商王对近畿的控制方式及近畿所担负的功能。

5. 边域是商王国四土最外围的部分,也是最能代表商后期王国政治地理特色的区域。本书第五章从分析边患告急卜辞和征夷方卜辞出发,勾画商人边域雄族的活动区域及政治地理特征,推测在征夷方过程中与之交战的方国地望,再由方国地理位置反推商王国疆界边缘。另利用贡纳卜辞考察边域担负的经济、政治功能。本章还要重点考察商王朝所设外服制的性质与对侯、田、男、任、卫、牧的管理方式,从而阐明王朝对边域的治理手段与边域地区所担负的职责。透过上述综合研究,亦能得出边域的居民成分。本书第六章以考古发掘材料为切入点,检验商人边域可能到达的实际四境范围。

6. 本书第七章将讨论商后期王国与边域外方国之间的关系。商后期王国与周边方国、诸族群的军事与政治之互动关系,不仅牵涉到商后期王国领域的变化,还直接影响商王国边域的形态。此外,本章还将以殷周之际的商、周关系为商王国与诸方国关系类比之典型事例,从周对商王国的附属到敌对直至灭商的转变过程中分析商后期王国晚叶之政治地理结构变化。

7. 本书末章作为结语是总结本论文将商王国领土分成王畿、近畿和边域三个圈环。透过各式卜辞资料与考古发掘材料,结合文献相互对比,所勾勒出的三圈环大致轮廓,及所明确的商王管理统治这三层次政治地理区域的手段与方法,并进一步总结归纳商后期王国的政治地理结构特点。作为结语,还将在前述基础上,探索商王国的国家形态,并衍伸讨论商代外服制对西周封建制起了何种作用。

四、本书所涉及的几个概念之说明

(一) “商前期”、“商后期”的分期法与殷代

本书在商代分期的方法上,仍采取邹衡先生^①、郑振香先生^②的观点,即将整个商文化分成前后两期,盘庚以前的商文化称商前期,盘庚及盘庚以后的商文化称为商后期,即本书所言之殷代。若以相应的考古学分期来看,即商前期包括二里岗下层一期、二期,二里岗上层一期、二期以及白家庄文化期暨小双桥文化期;商后期包括洹北商城早、晚期(藁城台西早、晚期)与殷墟文化一期至四期。

(二) “商人”、“商文化”与“商代文化”

本书所称之“商人”包括子姓成员、与子姓通婚的姻亲集团、异姓归属族群。此内涵中的“商人”,考虑到其所具有的共同地域、共同文化等因素,实际已接近于“民族”的概

①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4年第4、5期。

② 郑振香:《殷墟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国考古学研究》第一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年。

念,故亦可称为“商民族”。“商文化”则指由商人所创造的一种文化形式,可以透过武力、经济、通婚等传播方式,在非商人的活动区域流行^①。“商代文化”则为断代的判定,无论主流文化或非主流文化,其时间在商代这段时期者均可称之。

本书判断商后期商文化或商人的依据有两种:其一为墓葬,根据墓葬有无腰坑,坑中是否有殉犬,墓内有无殉人,随葬陶器组合中是否有觚、爵,其形制与殷墟出土陶器是否相似;随葬铜器组合中觚、爵等量配置与否,其形制与殷墟出土铜器是否类似。对上述条件作综合分析后,再分析墓葬中其他随葬因素,若铜器上有铭文,则亦成为有利辅助判断的材料。其二为遗址,遗址中最能反应族属讯息者即日常使用的陶器,将其与殷墟发掘出土陶器进行比对,不仅能判断是否为商文化,而且可以推测使用者是否为商人。

(三) 行都与圣都

本书在讨论商前期王都时,在张光直先生“圣都”、“俗都”^②观点的启发下,为更好地说明商前期“五迁都城”的现象,将顺应局势变动而设立的行政、军事指挥中心称为“行都”(行都中或许亦设有宗庙);将王室宗庙所在,举行祭祀活动,地理位置固定不变的都城称作“圣都”。

(四) 方 国

先秦文献中的“某方”(“某”是指某一族群之名)指所谓“方国”。如《易·既济》:“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孙吴虞翻曰:“鬼方,国名。”东晋干宝注:“鬼方,北方国也。”《诗·大雅·大明》:“维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郑玄笺:“方国,四方来附者。”由上可知,“方国”有域外之国之意。甲骨刻辞中所称“某方”,如“土方”、“鬼方”、“夷方”等,皆指代位处商王国域外之族群,且从卜辞看无论其与商王国的关系是敌对还是友好皆谓“方”。至今,学界在讨论商史时,“方国”一词已成为约定俗成、毋庸论证的观念。本书在叙述商王国疆域外各族群与商王国之关系时,为行文便捷起见,将位处商王国疆域外文化、文明发展程度不一的各族群统称为方国,文中遂不再详细分析各族群之文化、文明发展程度、规模大小等是否达到可称“国”的标准。

(五) 关于“商后期王国”和“殷代商王国”

商代后期即商王朝在盘庚迁殷后定都安阳的时期,历史上一般通称为殷代,在此时期的商王国可称为殷代商王国,故书名如是。至于本书内文中多使用“商后期王国”的称法是为了与书中同时使用的“商前期王国”形成一相对的概念,以便清楚地表示商王国发展的阶段。

^①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上的商文化是指商族创造并使用的,及商王朝建立后其他族使用商族创造的考古学文化。见佟佩华、刘延常:《八十年代以来山东商代考古的新进展》,《东南文化》1999年第6期,第16页。

^② 张光直先生认为圣都是先祖宗庙的永恒基地,圣都不变;俗都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事领导中心,俗都屡变,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要因素。见张光直:《夏商周三代都制与三代文化异同》,《中国青铜时代》第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15页。

第一章 商前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探讨

从汤灭夏建立商王朝开始,至盘庚迁殷前,可以归入商前期。商前期的王国政治领域为何?王都屡迁的原因为何?商前期商人势力范围达到何处?本章拟在前人论述基础上,进一步梳理、考证文献记载,并综合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对这几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期能大致勾勒出商前期王国政治地理结构及其特点。

第一节 商前期王国政治领域的文献观察

由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得知,在汤灭夏建立商王朝以前,商人已有较固定的活动范围,大致分布在河北西南部与河南北部一带^①。汤灭夏后,建立都城,其所控制的地域实已构成王国的政治区域。文献中有关商前期王国的实际政治领域记载如凤毛麟爪,惟由文献记载可知,汤都亳后,王都仍多有迁徙。王都虽未必皆处国土中心,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都所在对于王朝控制政治领域、疆土开拓及王朝自身安危仍具重心与基点的作用,所以可藉由文献所记王都之位置,了解其政治中心所在,即其领域重心之所在。商前期考古资料有助于弥补文献方面地理区域记载之缺乏,相关考古资料虽总体来看较零散,但对一定量的资料进行梳理后,仍能大致昭示政治领域之轮廓,将其与由文献所作都城位置考察的整合,可约略看出都城与政治领域变化之关系。

从文献所记商前期王国都城之稳定与迁移的频率来看,商前期约略可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成汤至雍己,定都亳;第二阶段是仲丁至盘庚,经历都城五迁。以下分别叙述。

一、成汤至雍己:居亳

成汤居亳为史学界不争之实。史书上有众多记载。兹依文献成文年代为序分别摘

^① 笔者采用先商文化分布范围即商人灭夏前活动区域的观点,现今学界普遍认同属于先商文化类型的漳河型、辉卫型都是商人留下的遗迹。漳河型主要分布在漳河中游的邯郸、磁县地区,辉卫型则分布在今河南新乡地区。见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8—90页;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7—123页。